

索罗斯论全球化

〔美〕乔治·索罗斯 著

王荣军 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索罗斯论全球化／〔美〕索罗斯著；王荣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623-2

I．索… II．①索…②王… III．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IV．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8396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Uǒ LUÓ SÌ Lùn QUÁN QIÚ HUÀ

索 罗 斯 论 全 球 化

〔美〕乔治·索罗斯 著

王荣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中 科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7-100-03623-2/F·446

2003年3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5%
印数10000册

定价：11.00元

George Soros

G E O R G E S O R O S O N G L O B A L I Z A T I O N

Copyright ■ 2002 by George Soro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本根据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7
导言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11
第一章 世界贸易组织	35
第二章 国际援助：缺少的要素	57
第三章 结构性改革：多边发展银行	93
第四章 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3
结论 迈向全球开放社会	137
附录 特别提款权建议	162
索引	167

前言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阐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更是为提出改善的办法。出于这一目的，我采用了对全球化的一种颇为严格的定义：我将它定义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讨论所关注的范围。我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机构的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同步，而我们的政治安排则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基于这些前提，我提出了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建议，它们可以使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更稳定、更公平。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无意中的联盟，它由极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左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组成。他们本同床异梦，但联起手来之后，却形成了破坏或削弱我们现存国际机构的威胁。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组建另外一种联盟，这个联盟的使命就是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机构，并创造我们所需要的

新机构来解决导致人们目前的不满情绪的那些社会问题。诚然，我们现存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IFTIS）^①还有些缺陷，所有的机构都难免有缺陷。这正是改进这些机构的理由，而不是将其毁坏的依据。

我认为自己具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资格来从事这项事业。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我一直是一名成功的实干家，这使我能以一个内行的眼光来看待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积极地参与弥补经济全球化种种缺陷的努力。我建立了一个包括许多基金会的网络，专门负责促进我所称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发展。我认为，目前形式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形式，它本应是全球开放社会。虽然我只是金融市场里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但对人性未来的积极关注使我独树一帜。我将过去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全球化的缺陷，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本书和几篇文章。我撰写的上一本书即《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②在提供解决办法方面着墨不多。从某种意义上

^① 我把国际金融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揉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术语（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organizations）。

^②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其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1年出版，王宇译。

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人们常常对我说：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获利和试图对该市场进行改革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我看不出有什么矛盾。我之所以热衷于改进已使我获得成功的国际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为了这个体系变得更持久。从时间上说，我的这一兴趣产生得比我进入金融市场早。我是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和苏联占领时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深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①的作者卡尔·波普哲学的影响。在成为对冲基金管理人取得足够的成就后，我立刻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即开放社会基金会（现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去“开放封闭的社会，帮助开放的社会更好地成长，并培养一种严谨的思维模式。”那是1979年的事。起初，这个基金会主要关注的是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开放，后来，在苏联帝国崩溃以后，则注重促进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而最近致力于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本书就是这一事业的副产品。

^① 1944年出版。

在努力建立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联盟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困难：动员公众反对某种东西，总是比动员他们支持某种东西容易得多。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必须足够普遍化，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但又须足够具体，以便能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联盟。这样一个议程不可能由个人单独提出。因此，我将书稿向各色人等广为散发，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我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并把其中我认为很有道理的那些建议融入了最终的成品。我相信最终定稿的书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公众可以支持，世界各国政府也可以执行。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用特别提款权（SDRs）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方案不能治愈全球化的所有弊病——什么方案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应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2001年9月11日，我打造最后成品的工作进展顺利，恐怖分子也在此时发动了袭击。这一事件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我觉得这书当时所谈的还不够深入。它局限于提出一套我在“9·11”之前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并未详细阐述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眼下这个时候正是这种观念获得大

家注意的大好时机。仅仅对恐怖主义宣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对前面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正确认识。

“9·11”事件震撼了美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别人看待他们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可能非常不一样。与平时相比，他们更愿意去重新评估这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为深入地重新思考、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而这在“9·11”之前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定为本书增加一章结论，概括我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其结构与本书的其余章节不同。它更像一本论战的小册子，而不是一份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报告；更多地是一种抽象的想象，而非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打算到时候再进一步详细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还需要经过本书的其余部分已经经历过的批评过程。实际上，它更需要这一过程，因为就它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我所知道的比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知识要少得多。

对是否把这个结论部分包括进本书里，我曾犹豫难决。因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共识，而这个结论部分可能危及这一目标。尤其是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实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我的结论对布什

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最终，我决定相信我想动员起来的公众。支持特别提款权的人并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观点。如果人民支持，一个民主政府就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即使它不喜欢我的批评。

志 谢

本书是以互动的方式写成的。我分发了近千册《论全球化（初稿）》，在许多会议上讨论其中的内容，收到了大量的书面评论。基于这些反馈，我修改了报告的内容，写成此书。我愿在此感谢所有贡献了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意见的人，因为这些评论和意见都极具价值。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出我到底采纳了多少他们的评论，但就我而言，这一过程既有教益又有乐趣。当然，我对最终成果负全部责任。

我要特别感谢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弗雷德·伯格斯腾，他组织了一次有高质量的参加者的午餐讨论会。还要特别感谢斯德哥尔摩的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的卡尔·特哈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安排了与乔·斯蒂格勒茨、阿玛蒂亚·森，坎迪多·戈祖波斯基和苏珊·乔治的专题讨论会。中欧大学（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与沃尔威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合作在

布达佩斯举办了三天的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会；而我则获得了在下面这些场合发表我的这些看法的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午餐讨论会，三十国集团的一次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一个休假地，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讨论会，以及世界论坛委员会的最初会议。对外关系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对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小范围讨论，参加者包括查尔斯·卡洛默雷斯，莫顿·哈尔帕林，罗伯特·霍梅茨，罗杰·库珀里奇，杰夫·兰珀，凯林·利萨克斯，艾伦·梅尔泽，埃德蒙德·菲尔浦斯，本·斯戴尔，埃德温·杜鲁门，保罗·沃克尔和迈克尔·温斯坦。我还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与我的基金会有关的人举行过许多有关的会议。

我从许多人那里收到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意见，这其中包括：莫顿·阿伯拉莫维茨，马蒂·阿提萨里，格雷厄姆·阿利森，安德斯·阿斯隆德，拜隆·奥格斯特，特雷斯·巴斯勒，迈克尔·本-埃里，弗雷德·伯格斯腾，加格迪什·巴格瓦第，加文·宾汉姆，艾伦·布林德，埃玛·博尼诺，杰克·布尔曼，莱昂·波茨坦，马克·马洛克·布朗，迈克尔·康德苏，托马斯·坎贝尔，杰弗雷·加纳达，威廉·克莱因，罗伯特·康拉德，乔治·柯文，鲍勃·迪康，菲利普·德·S. 特瓦伦特，琼·邓洛普，杰西卡·埃因霍恩，叶胡达·

埃尔卡纳，格雷斯·埃文斯，乔纳森·格雷，约翰·格雷夫·史密斯，威尔弗雷德·古斯，莫顿·哈尔帕林，伊夫林·赫夫肯斯，卡拉·希尔斯，罗伯特·霍梅茨，戴维·霍威尔，迈克尔·伊格纳提夫，迈克尔·珍德尔泽祖克，威廉·乔丹，米盖尔·基古埃尔，梅尔文·金，尼尔·金诺克，霍斯特·科勒，查尔斯·考尔勃，戴维·科腾，贾斯汀·莱茨，杰罗米·莱文森，阿纳托尔·列文，马哈穆德·马姆达尼，保罗·马丁，查尔斯·梅恩斯，弗雷德里科·梅耶，威廉·麦克多诺，艾伦·梅尔策，迈克尔·莫尔，比尔·莫耶斯，阿耶赫·纳伊尔，安德烈·纽伯格，西尔维亚·奥斯奇，吉姆·奥特维，托马斯·帕雷，斯图亚特·帕佩林，克里斯托弗·帕顿，莫里斯·帕斯腾，杰奎斯·波拉克，古斯塔夫·拉尼斯，安东尼·雷希特，丹尼·罗德里克，亚历克斯·朗多斯，戴维·罗斯曼，巴尼·鲁宾，理查德·拉芬，安德鲁·撒彻，格雷·桑普森，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蒂姆·斯坎伦，皮尔·肖雷，克劳斯·施瓦布，阿玛蒂亚·森，贾伊默·萨拉，克莱尔·肖特，约翰·西蒙，基雷尔·索洛科夫，瓦勒里·索伊弗，赫伯·斯特兹，丹尼尔·塔斯丘斯，詹姆斯·托宾，弗兰克·沃格尔，洛雷·瓦拉赫，约翰·威廉森，马贝尔·威斯·斯密特，詹姆斯·沃尔芬森，理查德·瓦特，和维尔莱特·森泰伊。对那些未能提到名字的人，我在此深表歉意。

在特别提款权方面，凯林·利萨克斯是我的顾问和经常请教的专家。冯妮·希尔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打印无数遍各种版本的手稿，她还协调整个项目，核对事实。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彼德·奥斯纳斯所起的作用也不仅是位出版商，他是这个项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来自公共事务出版社的保罗·格洛布和罗伯特·金泽伊以非同寻常的高效率完成了出版部分的工作。迈克尔·瓦雄主管联络。罗伯特·布尔斯汀敢于提出批评。与他们一起工作令人愉快。

导 言

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

全球化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可以被赋予很多的意义。就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讨论而言，我想把它定义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我认为，大多数被人们与全球化联系起来的问题，包括市场价值对传统上不属于它的领域的渗透，都可以归咎于这些现象。人们当然也可以谈论信息和文化的全球化，电视、互联网和其他交流形式的传播，但恐怕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以这种方式来缩小讨论的范围，我希望我可以把讨论控制在可把握的范围之内，并得出某些可用于制度改进的实际建议。

按照我们这儿对全球化的定义，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能使现在与50年前或甚至25年前区分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资本交易严加控制。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在私人资本流通受限制的环境

里，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①后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被逐步取消，海外金融市场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推动下获得迅速发展。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加速发展；1990年代初苏联帝国崩溃之后，金融市场才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这并不是国际金融市场第一次发挥如此具有支配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类似的情况很常见。国际资本流动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被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打断。显然，这一进程并不是不可逆转的。

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他们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 ability。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安排的特点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资本流向他方的能力损害了国家对经济实施控制的能力。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网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

① 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是世界银行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这一任务通过马歇尔计划完成。

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①

形成这一局面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目标，就是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而全球化对实现他们的目标助益很大。

人们并未完全理解自1980年代以来的演变的意义。这一演变甚至没有得到一般的认可。②资本总是竭力想逃避税收和管制，因此很容易将目前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倾向理解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有效的经济法则的表现。这实际上至少是英语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看法坚持认为，资源的分配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是最好的，对这种机制的任何干预都会损害经济效率。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全球化进行得非常成功。

确实，从很多方面来说，全球化都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发展。在创造财富方面，私人企业优于国家。而且，国家有滥用权力的倾向。经济全球化给个人带来的自由程度不是单个国家可以做到的。全球范围的自由竞

① 公共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未必减少了，但筹措和支出资金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② 比如，《经济学家有关全球化的调查》（2001年9月27日）就否认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征税和管制的能力。